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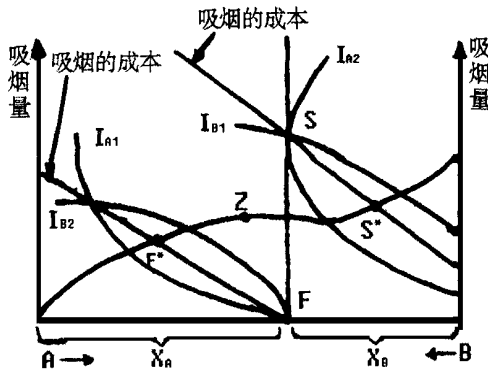
新制度经济学述评

王志波

90 年代，科斯和诺思两位新制度经济学家先后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可谓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诺思则承上启下，匠心独具地发现了科斯的理论所蕴含的丰富理论价值和极强的解释力，创造性地应用了科斯的理论来实证地分析和研究人类历史的发展和变迁，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两位新制度经济学家极大地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对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极大的和深远的影响，本文将集中对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理论、思想的分析，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演变作一简单的归纳。

—

著作并不丰的科斯在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得主时，突出地被提及的作品有《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的问题》。在前文中科斯提出了交易费用的问题，他对“企业为什么会存在”这一司空见惯的问题的分析入手，发现了人们利用市场时并非是没有摩擦的思想状态，交易时存在着交易费用，而且正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才使得企业这一代替市场的组织形式得以存在。因为企业对市场的代替可以节约交易费用。在《社会成本的问题》中，科斯一反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的习惯思维方法，从“如何使得社会总产出达到最大化”这一实证的角度出发来进行分析。他认为经济学关心的应该是如何使得社会的总产出最大化，而是否能导致社会的总产出最大化与既定社会所界定的产权结构和交易费用有关。将科斯的有关交易费用和产权的理论概括起来，便有了“臭名昭著的科斯定理”。在此，我们不妨引入科斯定理的一种说法：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中，由于外部性具有相互性，产权的初始的界定状态不会影响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化。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引导外部性所涉及的双方进行产权的相互交易，使资源配置流向高效率的方向，从而导致社会产出的最大化。在零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埃奇沃思图，对“科斯定理”作一简单、直观的证明（如下图所示）。



假定 A 和 B 两人同居一室，他们共同享有物品 X。A 享有的初始权利为 X_a ，B 享有的权利为 X_b ，假定 A 偏好吸烟，A 的行为对 B 将产生负效用。 I_a 、 I_b 分别表示 A 和 B 两人的效用无差异曲线。曲线 ZZ 为交换的契约线。从图中可以看出，F 和 S 分别表示产权界定的两种初始状态。F 意味着 A 不拥有吸烟的权利，B 拥有免受侵害的权利；S 则相反。如果交易费用为零，A、B 之间将发生产权的交易，交易的结果最终位于交换的帕累托交易最优线 F^* 或 S^* 点上，从而使得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化。A 和 B 两人的具体位置分别取决于 A、B 两人的谈判能力。利用这一图形我们可以对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1）在交易费用为正的世界中，法律的至关重要性将立即显现出来。科斯力图表明的是，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情况下，制度安排对资源的配

置、产出的效率的影响。在某些制度安排下会面临着很高的交易费用，从而使得有效率的结果不能出现。如果由于正的交易费用的约束，A 与 B 两人不能进行自由谈判，无法使得产权的初始配置发生有效率的交换，从而使得资源的配置被锁定于 F 或 S 这种相对于 F* 或 S* 的低效率状态，社会总产出不能达到最大化。如图所示，还可以看出：(2) 如果由于正交易费用约束，A 和 B 两人不能在交换的契约线达到均衡，可以采取一种政府替代的机制，使得 A 和 B 两人产权的初始界定直接位于交换的契约线上一点，譬如 Z 上。

科斯提出“交易费用”和“产权”两个概念，由此出发阐述了制度结构的生成、转换及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可以解释许多正统的和传统的经济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和难题，朝着“建立一个能使人们对生产的制度结构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的理论”作了开创性和富有成效的奠基和尝试。在《社会成本的问题》中，科斯力图阐述的是产权的制度安排、交易费用的高低与资源配置效率高低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而得出选择合理的制度结构的标准，即一种制度安排之所以被选择，其标准应在于该制度安排能够降低交易费用或者节约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交易费用的概念是科斯用于解决许多难题的行之有效的工具。科斯认为市场、企业和政府管制之间存在着一种替代关系，到底选择何种制度的组织形式应该取决于其交易费用的大小与高低，“实际上对政府问题要得出满意的观点，就得进行耐心的研究，以确定市场、企业和政府是如何解决有害效应问题的”，“当经济学家在比较不同社会安排时，适当的做法是比较这些不同的安排产出的社会总产品……”；“而且，我们必须考虑各种社会格局的运行成本（不论它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管理的机制），以及转成一种新制度的成本，在设计 and 选择社会格局时，我们应考虑总的效果。这是我所提倡的方法的改变”。科斯的这些分析和成果为经济学流派增添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一员——新制度经济学。

二

科斯在评论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时说：“他们除了给出了一大堆有待于理论来充实素材，并没有能够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体系……。因此，如果要追寻现代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先驱和前辈的话，并不能只因为他们较早地提出了制度经济学这一名词，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的先驱和前辈。”科斯在《社会成本的问题》和《企业的性质》等经典文献中运用了能被主流经济学所广泛接受的边际分析的方法。理性人会运用边际分析方法，把资源使用配置到边际收益最高的地方去。从科斯的分析可发现，科斯只是论证了“产权的重要性”和“权力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及指出产权界定的标准是产出的效率”。虽然他也论述了政府确立产权时的重要作用，但并没有直接回答政府将会如何界定产权。事实上，在上图中，政府如何确定 Z 点的位置，界定不同的初始产权给 A 和 B，对于政府来说可能意味着不同的成本与收益格局，政府在界定产权的时候必定要考虑这些因素。诺思着重地进一步分析了政府将如何来界定产权，以及产权的初始界定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绩效的影响。

产权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这种排他性的权利的确立、行使和保障有赖于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政治经济组织来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行使。国家（政府）正是在建立和保护产权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垄断性的政治经济组织，离开国家，人们将很难对产权作出全面和行之有效的分析；因此不能离开国家来抽象地讨论产权及其制度结构。

诺思运用历史的和实证的分析方法，并借鉴马克思的理论，对经济史中的制度发展与变迁作出了富有成效和创造性的分析和具有说服力的解释。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作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沿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适应——发展、不适应——阻碍这一线索来考察人类发展的制度演进的历史及其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下的经济实绩。发生交换的个人，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中会调整自己的行为来谋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从而影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造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适应——发展、不适应——阻碍的局面。诺思则着重从另一角度，即从微观和个人的层面来分析和考察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建立起制度变迁的微观基础。他认为是制度决定了体制的产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努力变成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接近的活动。”在令人沮丧的制度环境中，将面临着一个很高的利用制度的交易费用。

诺思等人也承认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为知识的基本变化结果的社会生产力的根本变化同样值得一书，因为它改变了产出长期供给曲线的斜率，使得人口的持续增长成为可能而没有出现古典经济模型中那种悲观的结果”。马克思与诺思等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不同，目的不同，时代背景也各异，但他们都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技术（生产力）和制度（生产关系）共同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经济实绩。

在制度变迁的理论体系中，诺思赋予意识形态于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地位。他说：“产业革命是以建立新的社会规范和伦理规范和持续努力”为特征的。”诺思特别强调这类因素对经济实绩的影响。“信仰结构通过

制度——正式和非正式规则——转化为社会经济结构”，“有效率的政策如果被认为是不公平的，那么将产生政治上的反映，使得（有效率的）改革停止或倒退。”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既定的技术结构、制度结构和信仰结构（意识形态结构）共同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经济实绩。其中技术结构决定了社会经济活动的上限，适宜的制度结构则将经济活动推向其上限，不适宜的制度结构则会使得经济活动呈现收缩的趋势，而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地位的信仰结构则决定了前面两者的实施特征。提高经济绩效可以通过三个层次来实现，即技术结构的变迁、制度结构的变迁和意识形态结构的变迁。而且前面两者往往需要后者提供义理性、合法性的解释和支持。有时变迁必须从意识形态结构的变迁开始。我国改革进程从“解放思想”运动开始便呈现出这一特征。尽管可以通过移植技术，模拟制度来提高经济绩效，但是可能因为意识形态等非正式的、非规范性约束差异而使得被移植的技术，被模拟的制度与其所应有的或所期望的绩效水平相去甚远，许多亚非拉国家正面临着这种境地。对于技术变迁和意识形态变迁的更为详细的讨论已超出本文的范围。

三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资金、劳动力、技术三项稀缺要素的短缺制约和影响经济的发展。由于零交易费用的假定，所以对于制度结构的分析被舍弃掉了，社会产出函数可一般地表示为 $Q = F(L, K, A)$ ，其中 L 、 K 分别表示劳动力和资本， A 表示既定社会的状态和技术水平，而且几种生产要素之间具有相互的替代性。在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存在许多资金、劳动力、技术三大要素结构相类似，经济绩效却迥然不同的例证。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诺思和托马斯对此就作出了有力的说服和证明。生产要素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异，其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差异。制度要素的短缺或者制度供给的滞后同样会影响和制约经济的发展，而且制度是具有“资产专用性”的要素，制度的短缺不能或者说无法用其他要素来进行替代。

如果将 r 看成包含了这样一系列制度结构在内的制度的集合，即 $r = \{r | r = PR, SM, D, LR\}$ ，式中 PR 表示产权， SM 表示社会道德， D 表示拥有的意识形态， LR 表示社会法律和法规。 r 还是政府（ G ）行为的函数，即 $r = r(G)$ 。将社会的制度结构 r 纳入生产函数中，则生产函数应改写为 $Q = Fr(L, K, A)$ ，式中 r 表示制度结构。 $Q = Fr(L, K, A)$ 正是诺思力图证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结构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诺思的新经济史理论是对科斯交易费用理论在具体的、历史的层面上的运用。将微观层面的科斯定理加以拓展，便可以得到“宏观层面的科斯定理”：如果政治、经济体制中的交易费用为零，那么经济的发展便和政府权力的初始分配以及政府的组织形式无关；如果政治经济组织体制中的交易费用不为零，存在着正的交易费用，那么经济的发展则和政治权力的初始分配以及政府的组织形式密切相关”。

诺思在 $r = \{r | r = PR, SM, D, LR\}$ 和 $r = r(G)$ 两个层面，运用历史的和实证的分析方法，吸收和借鉴马克思的理论，对人类经济历史的发展与变迁作出了富有成效和创造性的分析和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诺思分析了产权、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建构了制度—制度变迁—经济绩效的理论基石。诺思说：“我研究的重点放在制度理论上，这一理论的基石是：（1）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2）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3）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这种理论解释为何人们对现实有不同的理解”⁴⁰。在《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和《时间进程中的经济成效》等一些文献中，诺思将交易费用的标准具体到了制度变迁的效率评价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意义上来认定：（1）无论是正式规则，还是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非正式规范，其变迁是否有效，取决于它们是否降低了交易费用；（2）无论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还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无论变迁是发生在个人、团体还是政府层次，制度的变迁和转换都具有交易费用，实施变迁的主体都要进行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制度变迁的具体方案和组织实施，将面临着交易费用的约束，交易费用的高低与大小取决于变迁的初始条件。有些变迁的初始条件就面临着高昂的交易费用的约束，使得制度的变迁，制度的交易无法实现，锁定（locked-in）于一个无效率的状态；（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人类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⁴¹。诺思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制度变迁是个“道统”，即“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的过程，“路径依赖是指过去对现在和未来的强大影响”，“道统，是指政策的制定者所拥有的能改变经济发展方向的自由度受制于行为人的信仰结构和制度矩阵”⁴²。制度变迁是一个路径依赖的过程，变迁还要考虑到变迁的时间因素，时间也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一种“交易费用”，并且可以成为变迁是否有效的标准之一。

诺思以及其他新制度经济学家还着重地、具体地分析了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环境、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刚性、制度的稳定性、统治者（集团）理性几个关键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以上几个因素将渗透到政治、经

济体制的各个层面上去, 形成政治—经济体制中各种形式的交易费用, 影响各个社会阶层的成本—收益结构, 造成社会发展或停滞的局面。

四

赫伯特·西蒙曾就新古典经济学的关于理性人的最大化模型提出了质疑, 他认为在有限的理性水平下, 所遵循的不是最大化的模型, 而是满意的策略。西蒙注意到了人们决策时面临着许多约束条件, 但是他是从改变人们的决策的模型方向进行学术创新。他的“满意水平”的决策模型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约束条件下经济人寻求最大化”的模型这个“硬核”(hard core)¹³。西蒙注意到了人们的决策面临着约束条件, 注意到人们的决策是有成本的。科斯则明确了这一点, 并把这作为约束条件加入到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的模型中去。可以说, 加入交易成本而重构的“最优化”模型更具有学术魅力。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零交易费用模型进行了修正, 并将修正后的模型动态化, 开拓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和视野。

科斯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 为经济学园地提供了一种颇具学术魅力的经济理论。许多学者站在科斯这位经济巨匠的“肩膀”上使得新制度经济学迅速发展。从70年代开始的20多年里, 有关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大量地涌现, 在这一领域中集中了一大批诸如张五常、登姆赛茨(H. Demsetz)、巴泽尔(Y. Barzel)、A·A·艾尔奇安等著名经济学家, 即便是在其他领域研究的经济学家也无法完全摆脱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交易费用、制度变迁等高频出现的概念及其思想的影响。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所提出的产权和交易费用成为核心概念和中心思想, 由交易费用理论衍生出了许多对现实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指导意义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支理论, 如委托—代理理论、寻租理论、激励理论。科斯的思想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学范围之内, 也渗透到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等等许多的社会科学中。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 很少有一种理论能够成为一个学派, 产生一个经济学的分支, 但是科斯的经济思想不但成为一个学派, 而且至少产生了产权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这两个经济学的分支学派。

中国正处于新旧体制转换的制度变迁的进程中。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分析方法正广泛地为我国经济学者所接受, 并被用以分析中国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从 $Q = F_r(L, K, A)$ 来看, 我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在劳动力(L)、农业技术(A)和农业资本(K)都没有明显的改变的情况下, 农业生产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其原因很显然在于农业生产制度的变革。从生产队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制度的变革, 使生产单位由生产队变为家庭农户。在家庭内部, 家庭成员的努力可以内部化于家庭内部之中, 家庭成员之间很少存在“搭便车”动机, 这些因素极大地降低了制度运行的费用, 提高了产出的效率。由于制度(r)是政府行为(G)的函数, 即 $r = r(G)$ 。因此, 政府的目标是致力于能够促使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由于政府是制度的垄断供给者, 因此, 经济的发展离开了政府是不行的, 但政府往往又是造成经济停滞和落后的根源。这是因为制度的变迁和实施同样是需要成本的。

中国经济制度转型为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实践机遇。我们期待着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国情化, 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 从而提供一种智力上, 亦即理性上的支持。

注释:

- 罗纳德·哈里·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 中文1版, 161、191页,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转引自斯瑞恩·依格特森:《经济行为与制度》, 英文版, 10页,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0。
这些思想可参见科斯的《联邦通信委员会》、《社会成本的问题》和《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等文献。
诺思和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 中文1版, 3页,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8。
10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中文1版, 192、191、7页,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12 诺思:《时间进程中的经济成效》, 载《社会经济体制比较》, 1995(6), 18~25页。
13 斯瑞恩·依格特森:《经济行为与制度》, 英文版, 246、9页,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0。
11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中文1版, 第1卷, 603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经济学系)
(责任编辑: 曾国安)